

歐美漢學研究的發展

——「歐洲漢學史國際研討會」會前的省思

黃俊傑

96-97

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

我們今日回顧歐美學術界漢學研究的發展歷程，似乎可以以二十世紀作為觀察的分水嶺。二十世紀以前歐洲社會及知識份子對中國以及中國人的瞭解，基本上是透過傳教士的報導。十六世紀及十七世紀的耶穌會士筆下的中國，是一個强大理性文明，政治制度完善，婦女地位甚高，不過中國人也有迷信、縱慾、科學落後等現象。這個時代的歐洲商人，尤其是荷蘭人，則認為中國人乃是邪惡、無恥的化身。十六世紀後半葉爆發傳教士內部的禮儀之爭，使得中西之間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礙。但是，在歐洲也引發了想去瞭解中國的強烈動機，尤其是中國的語言文字及古代歷史，當然這與當時想建立世界語與世界一源論的基督教立場有關。同時，也由於禮儀之爭，引起歐洲人對中國人到底是無神論者或是自然神論者的辯論。1685年，耶穌會傳教士衛匡國(Martin Martini)出版了「中國古代史」，這是歐洲漢學史上第一本關於中國歷史的著作。

在十八世紀中期以前，歐洲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，是一個理性而幸福的國度。大哲伏爾泰(Voltaire)對中華文化頗為心儀。在十八世紀歐洲藝術中，「中國風」的庭園、裝飾、器具、建築也成為歐洲人欣賞、模仿的對象。「重農學派」以及「百科全書派」的學者們，都以中國為模範來鼓吹他們的理想。但是到了十八世紀中葉以後，中國的優美形象逐漸破滅，亞當·斯密及馬爾薩斯都把中國看做是靜止黑暗的國家。十九世紀初期黑格爾是集十八世紀末對中國觀感之大成的人，他細讀耶穌會士及商人、新教教士兩方面截然不同的報導，在他的世界歷史的大體系中，中國仍落後在「自由之體現」的起步階段，專制君主是中國境內唯一自由的個人。

十九世紀開始，中國與歐洲接觸頻繁，耶穌會士重新來華，繼續提供第一手資料供歐洲人研究中國，新教教士也進入內地傳教，許多人並從事寫作。字典的編纂、中國經典的翻譯、文學作品的介紹都在這個時期開始進行。在

歐洲的學術機構也開始設立漢學講座，職業漢學家開始出現。1814年法蘭西學院聘請盧繆沙(Abel Remusat)為第一位講座；英國倫敦東方研究院也於1825年開始教授中文；1855年荷蘭萊頓大學也設立漢學講座，迄今仍是世界漢學重鎮。各種學報期刊也開始展現研究成果，在這時期法國出版「亞洲學報」(*Journal Asiatique*)，萊頓大學出版的「通報」(*T'oung Pao*)，百年來一直是很有份量的漢學研究期刊。最具代表性的十九世紀漢學家是英國的理雅各(James Legge)，他在王韜的合作下所彙譯的中國經典相當經得起時代的考驗。十九世紀歐洲傳教士觀察中國農村所留下的記錄，具有高度的史料價值，是研究十九世紀中國社會極佳的第一手資料。1950年代初期蕭公權院士撰寫「中國鄉村」(*Rural China: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19th Century*)巨著時，就參考了大量的歐洲傳教士的著作。但是通貫整個十九世紀，漢學在歐洲仍尚未在正統學術界居於重要地位。

比較嚴謹的漢學著作大約從二十世紀開始，法國則是二十世紀初期歐洲漢學的重鎮。當時的法國漢學與社會學傳統有相當密切的關係。1900年法國學者沙畹(Edouard Chavannes)在法蘭西學院開始講授中國歷史，他將「史記」譯為法文，共五大卷，堪稱巨著，「序論」一卷價值尤高，日本漢學家岩村忍曾將此書譯成日文出版。沙畹也翻譯西突厥史料中有關法顯、玄奘的事蹟。沙畹的大弟子葛蘭言(Marcel Granet, 1884-1940)浸淫於社會學多年，深受社會學大師涂爾幹(Emile Durkheim)的啟發，所以他能看到一般歐洲漢學家所未見的一些歷史現象。1922年，葛蘭言以六週時間完成「中國的宗教」(*La Religion des Chinoise*，由Maurice Freedman英譯為*The Relig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*)，可以視為涂爾幹(E. Durkheim)社會學在古代中國社會研究上的應用。葛氏對中國古代宗教的研究特別注意家庭與儀式。

1930年代德國的富蘭閣(Otto Franke)以近代史學方法撰述的「中華歷史」問世，而韋伯(Max Weber)更以比較歷史的眼光，來探討中國的儒家與道家思想、官僚制度與經濟發展的情況，為漢學研究開闢新徑，對二十世紀的西方漢學研究產生相當深刻的影響(以上參考黃俊傑、古偉瀛「西方漢學研究的發展」，史學評論，第12期，1981年9月，頁1—9)。

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美國的霸權地位確定。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，許多優秀的中國學人浪跡北美，因緣湊合，促成了北美學術界漢學研究的發展，大有凌駕歐洲之勢。戰後北美的漢學研究，從五〇年代少數重鎮如東岸的哈佛、西岸的華盛頓大學等獨佔鰲頭，到了六〇、七〇年代以後多元並立的局面，加州大學各校區的漢學研究的發展，更是令人注目。在這種轉變的過程中，北美漢學研究的重點，也從早期注重中國近代史而逐漸上推到明清以及唐宋研究。

戰後北美漢學研究的新局面，與戰前歐洲的漢學傳統頗有不相同。歐陸傳統漢學大師(如高本漢先生)相當重視文獻訓詁考據之學，戰後北美的中國研究則多半將這種文獻研究視為手段而不是目的。更重要的是以下三個新趨勢的茁壯：(1)集體性的、長期性的研究計劃出現；(2)社會科學研究理論與方法之滲透到中國研究之中；(3)中國近代現代史研究的蓬勃發展。這三個趨勢常交互作用，互相影響。例如從五〇年代開始，美國亞洲學會的中國思想研究委員會(Committee on Chinese Thought,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)在1951年至1962年之間，結合美國、中國及其他各國漢學家共同研究儒家思想，而陸續出版了一系列的論文集。這一系列的集體研究，與當時美國學術界盛行的社會科學研究觀點頗有關係。戰後美國漢學界，挾其蒸蒸日上的國力，以龐大的經費支援中國研究，使以上三個研究趨勢日益興盛。

但是，在戰後北美漢學研究的新發展之中，却隱藏著一個漢學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之間的緊張性。傳統漢學的研究方法朝向人文現象的「特殊性」(particularity)的理解；社會科學則傾向於人文現象的「普遍性」(univer-

sality)的掌握。兩者有異有同，正如清儒章學誠所說的，這是「千古不可合之同異，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」(文史通義·朱陸)。為了釐清漢學與社會科學的異同及其研究方法，1964年8月及11月出刊的美國「亞洲研究學報」(*Journal of Asian Studies*)就刊載了蕭公權，J. R. Levenson, M. C. Wright, G. W. Skinner, M. Freeman, F. W. Mote 及 D. C. Twitchett 等學者的論文，加以探討。

戰後北美的中國研究學界中這種「漢學乎？社會科學乎？」的緊張性的另一面，就是「傳統漢學乎？現代中國研究乎？」這兩個面向的緊張性也在近二十年來的歐洲漢學界逐漸表面化。正如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院長許理和(Erik Zürcher)教授所說的：「比起1960年以後的美國，一般說來，我們可以講歐洲的現代及當代中國研究發展略顯遲緩。歐洲傳統漢學直到六〇年代底、七〇年代初，才領教了這個急速發展成長的雙胞小兄弟。在許多歐洲大學和研究機構裏，當代中國研究的欣欣向榮曾經導致雙方的緊張和誤解。這股『新興勢力』(通常非由四書陶養成器，而受的是政治學或經濟學訓練)指控傳統漢學家是已然僵滯的老古董；漢學家則為當代中國專家打上膚淺和政治化的標記。」許教授所說這種「傳統漢學家」與「現代中國專家」之間的緊張性，時至今日似乎仍存在於歐洲漢學界。去年七月間，萊頓大學與國立臺灣大學合辦「中國文化中的價值規範及其普及化」國際研討會，邀請國內及歐陸漢學家共聚一堂，切磋學問，在為期一週的會議期間，我就時時感受到歐洲漢學界中仍存在著這種「千古不可無之同異」。

這次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所主辦的「歐洲漢學史國際研討會」，在當前歐洲漢學研究處於十字路口的關鍵時刻在臺北舉行，實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。歐洲漢學有三百多年的傳統，收藏的中國文物至為可觀，但戰後隨著世界局勢的轉移而趨於沒落，而且面臨日益興盛的「現代中國研究」的挑戰。這次研討會的舉辦，在同顧歐洲漢學史的基礎，我們期望能更清楚的找出未來漢學研究的新方向。

凡索贈本刊之學者請書明姓名、學歷、所屬機構或學校、研究主題、已出版之主要論文或專著等項，寄臺北市中山南路20號「漢學研究通訊季刊」收。已受贈本刊學者，如收受地址變更，請通知本刊。
